



▲內地社會保障制度安排還不足以充分提高生產率，進而解決養老問題，所以需要優化制度安排、尤其是推進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經濟觀察家

影響社保可持續性的三大因素為人口、勞動力市場與勞動生產率。分解來看，老齡化與高齡化趨勢不可逆轉，勞動力市場則存在結構性就業矛盾。筆者認為，未來要完善社會保障，並不缺物質財富，而是缺少制度安排。

優化社保制度 應對老齡化挑戰



人口經濟
蔡昉

在影響社保可持續性的三大因素中，第一個是人口因素，主要表現是老齡化率迅速提升。按照中國人口與發展中心預測，2032年65歲以上人口佔比將超過21%，按國際定義即為重度老齡化社會。屆時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很深，但人均收入仍然處在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較低水平上。比如中國人均收入從今年或明年開始將超過1.4萬美元，到2032年距離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還有一點距離，但老齡化率已經相當高了。這意味着，未富先老將是一個重要國情。

人工智能提高效率

第二個是勞動力市場因素。此類因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 中國結構性就業矛盾表現越來越突出，主要是「一老一小」問題。一方面，青年失業率高。最新數據顯示，7月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升至17.8%。另一方面，臨近退休和未來延遲退休的人群也面臨較大的就業困難，主要表現為退出勞動力市場，降低勞動參與率。

2) 就業非正規化。新就業形態、靈活就業具有趨勢性，幾乎無法遏止，這類就業模式帶有一定的非正規化特徵，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保覆蓋率低。

3) 崗位破壞顯性化。過去創造的崗位絕大部分被轉化為淨增就業，現在創造出的崗位有越來越大的部分被破壞掉了，儘管淨增總量仍然較大，但創造的崗位與淨增的崗位之間數量差距擴大了。

4) 人工智能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是不可阻擋的，如果應對不當，可能在結構性就業矛盾基礎上產生加倍的影響。應對策略的當務之急之一，則是縮小兩大社保制度的差距。目前，職工養老保險與居民養老保險的給付水平之比雖然下降，但絕對數量差仍在迅速提高，政策應加快縮小這個差距。

第三個是勞動生產率因素。在人工智能發展下，我們應該有一個確定的預期——勞動生產率提高潛力是無限的。撇開人工智能因素，即使按照GDP潛在增長率預測來推算，到2035年之前，計算出的「瞻養生產率」——作為繳費主體的20至62歲人群所對應的GDP，年均增速為5.55%，明顯高於按同一口徑計算的老年撫養比增長速度（4.90%）。這意味着隨着勞動生產率提高，社會瞻養老年人的能力可以做到水漲船高。雖然現在有對於人工智能發展泡沫的擔憂，但總體而言，人工智能應用一定會在基準的勞動生產率提升之上帶來額外的提高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還不足以充分提高生產率，進而解決養老問題，所以需要優化制度安排、尤其是推進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未來蛋糕必然會做得更大。根據Epoch AI智庫的估算，在不同工作任務被人工智能自動化的假設下，經濟增長速度均可以達到高於以往的水平，這意味着生產率提高的預期得到普遍認可。如果這個預期是可靠的，就為養老保障制度的代際轉移和社會共濟性質創造了足夠堅實的基礎。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由於老年撫養比顯著提高，現收現付性質的養老保障制度未來不可持續。現在看，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大大快於老年撫養比提高速度，過去的那種擔憂就可以消除了，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無需有所作為。

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就業的正規化水平。目前非單位就業（包括私營經濟就業、個體就業和未被單位視為正式僱用的人員）已經佔到城鎮就業的60%以上，約3.1億人。雖然不能簡單說這是非正規就業，但其非正規程度一定高於單位就業。一般估計的新就業形態有8400萬人，除此之外還有2億靈活就業人員，這些群體仍處在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盲區。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就無法保證社會保障充分覆蓋，無法實現對這部分群體退休後生活的保障功能。

警惕收入差距擴大

另一方面，警惕收入差距出現新的擴大因素。十八大以來社會收入分配有所改善，特別是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尤其明顯。不過，全國基尼系數在2015年降到最低點後就停止下降，徘徊在0.465至0.466左右。過去整體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城鄉收入差距造成的，現在城鄉收入差距還在縮小，但城鎮收入差距擴大，成為基尼系數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就業非正規化、農民工出現的逆向流動、人工智能造成的新衝擊，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使收入差距有所擴大。

社會保障問題涉及社會經濟民生，研究的主要關注點現在看，不應是賬戶問題或精算問題。在進行戰略思考、頂層設計和政策制定時，要始終保持的關注點是第一支柱（社會保險）。在城鎮就業的60%以上都具有非正規性的情況下，第二支柱（社會救助）、第三支柱（普遍福利）的作用很有限。

解決問題的出路仍然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1930年在《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性》所預言的，勞動生產率會以數倍的幅度提高。雖然現在還沒有實現一周只工作15小時，但勞動生產率確實達到了他的預期。這意味着，人工智能所背書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如今真的成為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現收現付制度是合理的，是實現代際轉移、代際分攤、代際分享的制度基礎。

人工智能生產率提高後，必須得

到分享，而這種分享不會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過去人們常常討論的「索洛悖論」，講的就是技術創造和應用在企業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是不平衡的，結果只能提高局部生產率，全社會生產率不會自然而然提高，提高了的生產率也不可能在社會自動得到均等分享，因此必須靠制度安排來解決。我們的基本養老制度，撇開技術細節，核心是應該有助於分享現在和未來的生產率提高。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兩點研究建議，希望學界和政策研究界進一步研究關注。

首先，建立普惠性社會保障體系。按照人工智能時代對普惠性社會保障提出的更高需求，可以借鑒一些廣為討論過的制度形式。1) 把最低工資制度改造為「生活工資制度」，即按照社會必要的生活標準，保證就業者的基本收入。2) 考慮「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的做法，以應對人工智能對工作的長期、根本性替代。3) 無關繳費、無需身份識別的全民養老金制度。當然，任何制度形式都不能全盤照搬，但其中一些理念，完全可以融入既有的安排形式中。

目前中國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有着天生的優越之處：一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動建立和管理；二是極低的繳費門檻和要求；三是幾乎不需要識別即實現全面覆蓋。這些普惠特點值得發揚光大，應該順勢而為把目前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成社會養老金。中國需要一個社會養老金制度，任何國家最終都要靠這樣的制度才能實現應保盡保。特別是在人工智能時代，在相當程度上制度已經識別不出來誰是懶漢、誰不是懶漢；誰的人力資本決策做對了、誰做錯了，所以普惠是最好的選擇。

打破現收現付悖論

其次，重新思考名義賬戶制。世界銀行曾向中國推薦名義賬戶制，站在現在的立場上看，這一建議值得重新思考，其中可以借鑒的理念和做法就是「記賬」。繳費被記錄下來，但不必做實。現收現付制度留給後代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確實需要記賬，記賬一是可以解決退休年齡調整的制度化問題，二是可以解決收支結餘水平制度化問題——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減支增收就是好事、結餘就是好事。實現制度化，就意味着提高現收現付制繳費的積極性和預期的穩定性。

筆者多次講到，不僅中國的老年人不敢消費，其實勞動年齡人口也不敢消費，因為後者面臨一個所謂「現收現付悖論」，他們要繳費，要瞻養家裏的老年人，還要給自己進行預防性儲蓄。如果用名義賬戶制良好解決預期問題，這個悖論就可以被打破。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發揮金融與服務優勢 港當走出去跳板



共創共享
戈峻

行政長官
李家超在最新
一份施政報告

中，用了相當篇幅提出多項協助內地企業出海的措施政策，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市場調研、商貿配對等內容。在企業家面對內地同業競爭的「捲」，要把目光放在海外的時候，香港確實是那些猶豫者最好的助力。眾所周知，香港一直是內地企業走出去最理想的跳板，現在這個跳板主動靠近過來，給予全面支援，對我們而言是莫大喜訊。

據施政報告所述，特區政府將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同時在多方面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出海專班由投資推廣署、貿發局和香港駐內地辦事處組成，這個一站式平台將協調各政策局、部門和機構，為出海企業制訂多元方案。例如，金融管理局會推動銀行業，尤其內地銀行在港設立區域總部，利用香港優勢輻射開拓東南亞和中東等地區市場；鼓勵擬出海內地企業可在香港設立財資中心和區域總部，進行跨境結算、匯款和融資等，並聘用香港會計、法律等專業高增值供應鏈服務拓展海外。政府明年上半年還會完成研究來港設財資中心等優化稅務寬減措施，增強企業借港出海的吸引力。

此外，內地企業也可透過香港推廣優勢，對接環球買家，打造國際品牌。例如政府部門會連同商界組織如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等，帶領企業海外考察商機；發揮香港展覽業的優勢，舉行國際性會議、論壇和展覽，鞏固香港作為內地品牌「走出去」和環球品牌「引進來」的最佳平台，同時支援業界舉行更多有利推動品牌發展的活動。再者，利用好大灣區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的優勢，提升人流、物流、數據流、資金流的互通，讓粵港澳三地的優點「匯流成海」，打通「內地—香港—海外」的全鏈條便捷流通。

筆者常常說，面對當前形勢，與其「內捲」、不如外拓。當下最重要的一種外拓方式，就是直接跳出國內紅海，走向全球藍海尋找新增長空間。用空間換取利潤，用全球化布局打破內捲困局。據9月初國家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管局聯合發布的《202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指出，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922

億美元，佔全球份額的11.9%，較2023年提升0.5個百分點，連續十三年列全球前三，連續九年佔全球份額超過一成。近年越來越多內企明白到走出去的重要性，截至去年底，中國境內投資者總共在全球190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企業5.2萬家，當中七成境外企業達到盈利或持平，正享受着出海的成果。

更重要是，中國企業出海不單單是企業自身獲益，《公報》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對外投資帶動貨物出口2110億美元，同比增長13%，佔同期貨物出口總值的5.9%。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3.6萬億美元，向投資所在地納稅821億美元，年末境外企業員工總數502.1萬人，其中65.8%為外方員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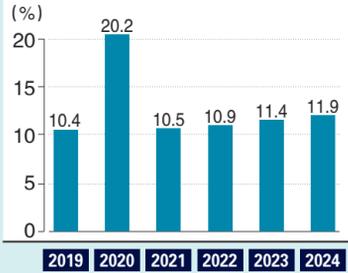
因此，出海其實是一個對內企、香港及海外市場三贏的局面。

內捲激烈 出海成必選項

更深一層去想，過去有企業對出海感到猶豫，嫌麻煩、怕外語，擔心人生路不熟，恐懼出海過程中碰釘子，但當國內捲得不行的時候，出海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必答题。實際來講，可以不用害怕出海，但不能不考慮出海風險，缺乏長期戰略、欠缺足夠資源、走入錯誤市場，都可能令出海的努力付諸東流。所以筆者常說，要降低出海風險就要借船出海，這跟借助平台的力量搞創新一樣，利用平台的企業家人脈資源、洞察海外市場信息的資源、最新技術的資源等等，造就企業揚帆起航的東風。而現在不單有民間平台，我們還有香港主動擔起強大的政府平台角色，在民間、政府雙平台的加持下，今時今日的企業出海已不只是必答题，而且是「乘风破浪」的送分題了。

（作者為天九企服董事長兼CEO）

中國近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全球佔比



淺談公屋租置計劃的定價



樓市新態
汪敦敬

最新一期
施政報告發布
後，特首李家

超被傳媒問到為何沒有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答到原有租置計劃並非所有單位均成功出售，要研究「有什麼阻力」。地產代理作為市場證人，筆者想分享所見到的，希望對租置計劃政策制定有所幫助。

筆者覺得公屋的價值觀念在近年有所扭曲，有人帶風向將幾個錯誤的價值觀念向公眾洗腦，最嚴重是將公屋評價為住戶的終身私產，他們更用「人生勝利組」、「公屋住一世」、「得公屋得天」之類口號來形容，既然市民錯誤認為平租的公屋可以住一世，住戶自然不會上進，亦不會積極去置業。數據上亦反映出來，公屋的流轉率長期只有約1%，直至近一、兩年，本屆政府積極面對濫用公屋的問題，流轉率才開始有少許改善去到2%。

公屋是政府的一個「虧本」項目，亦因此，政府不可能長期負擔到過於龐大的公屋規模，這是一個事實。公屋可以讓貧困的家庭終身解決住屋問題，甚至有機制在戶主去世後，公屋仍可以給下一代居住，這是令人驕傲的社會救生網，但是這只應照顧合乎資格的低收入人士。當公屋住戶擁有足夠資產和收入超過一定水平的時候，代表住戶應搬出公屋，否則就等於剝削了公屋候補人士的權利和上樓機會。當人人都當公屋是私人資產的時候，公屋流轉率自然低，公屋候補者的權利自然少，虧房數量就不斷增加。

扭曲價值觀念會引致一些更嚴重的後果，就是當政府收回濫用單位時，個別住戶會覺得資產被剝削，感到氣憤難平。「殺君馬者道旁兒」，錯誤價值觀念可以殺人不見血，往往都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如果政府想將租置計劃的單位清貨賣出，這就是一個銷售層面的問題。當然，政府的銷售不可以商業化，但仍然屬於銷售範圍，必須合乎市場反應。

如果政府想賣公屋的效果好，首先要檢核有關公屋的質素，在折舊率之下，是否合乎「賣相」。不少公屋都很殘舊，亦有維修不足的角落，政府必須做一些基本的維修，否則有關殘舊或者維修不足的屋苑自然銷售不理想。

太高欠吸引 太低變相賤賣

賣公屋最實際的銷售方式其實是價格優惠，筆者當然不想政府賤賣資產，但的確不同質素的單位之間定價是要技術的。日前新聞報道有政黨認為出售公屋要合乎建築成本，議員這個觀念有良好出發點，但其實並不實際，因租置計劃賣出的往往是舊的公屋，是否用這些舊公屋當初建屋的成本作計算？這無意義。那是否用新的建築成本計算？其實又對買家不公。舊樓應該計折舊率，買家還要承擔日後的維修費。筆者還想提醒，租置計劃的初心是提高市民的置業率，但在這情形之下，還包括減低舊公屋長期虧蝕的財政負擔。

租置計劃除了提供置業的機會之外，亦將資助者變為納稅人，而這些公屋住戶成為有關單位業主的時候，固然可以享受到市場給予這個公屋的升值價值，同時也要承擔單位之後的維修責任。所以，有關單位不適宜定價太高，需要留下空間給業主享受到合理的升值空間以補償長遠的維修費用。

另外，租置計劃往往會出現業主與租客混雜住在同一大廈的情況，筆者認為如果政府有一個完善而且有足夠時間準備的租置計劃，同時向不願意買入公屋單位的租客作出搬遷優先安排。公屋住戶始終是租客，業主是可以行使搬遷的要求，政府就可以適當改善或者全部改善將業主和租客混雜一起居住的問題。

以上幾個重點，筆者認為可大大增加租置計劃的銷售情況，希望有關意見可以給予特首或者房屋局有用的參考。
（作者為祥益地產總裁）